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一卷 (远古——1840)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张楚廷 张传燧

副 主 编 邓洪波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岳麓书社

湖南教育史

第一卷（远古——1840）

总 编 冯象钦 刘欣森
本卷主编 张楚廷 张传燧
副 主 编 邓洪波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杨海波	邹时炎	陶西平	
顾问: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主 编:	汤世雄	宋恩荣			
编 委:	王日新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钦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宝琪	姜树卿	高 志	阎国华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湖南教育史》研究、编写工作领导小组

顾 问:吴向东 唐之享
组 长:许云昭
副 组 长:蒋作斌 李洪基
成 员:许云昭 蒋作斌 胡学军 李洪基
朱俊杰 张作功 陈元魁 李 丽
陈白玉 冯象钦 张国骥 申纪云
主 审:许云昭 蒋作斌 李洪基

《湖南教育史研究》课题组和《湖南教育史》编委会

总 编(课题组长):冯象钦 刘欣森
副 总 编(课题组副组长):刘先捍 孟湘砥
张楚廷 陈 钧
编 委(课题组成员):冯象钦 刘欣森 刘先捍
孟湘砥 张楚廷 陈 钧
周秋光 莫志斌 张传燧
邓洪波 罗春晖 胡国强
分卷主编第一卷 主 编 张楚廷 张传燧
副主编 邓洪波
第二卷 主 编 周秋光 莫志斌
第三卷 主 编 刘欣森 孟湘砥
副主编 罗春晖 胡国强

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公室

主 任:刘先捍
成 员:胡国强 黄其超 谭小京 蒋书同

总 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地区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中国教育史的全貌。

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

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000—前 2000 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文化区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各地区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沿袭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

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播,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现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新思想,以及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

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

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

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绪 论

《湖南教育史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

1997年4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地方教育史研究的通知》，指出：地方教育史研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规划、组织，并按行政区划开展的大规模、系统的教育史研究。这对教育史学科建设，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力量对本省、市、自治区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本省、市、自治区教育史。湖南省教育委员会（2000年改称湖南省教育厅）遵照这个《通知》，于1998年开始，敦聘省级教育行政的有关老同志和高等学校的有关专家、教授担纲，成立湖南教育史课题研究和编委会，并先后组织近50名干部、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工作，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奉献出我们的研究成果——《湖南教育史》。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也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多人口和56个民族的大国。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但他们居住在辽阔的国土上，自然和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因而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存在“多元一体”、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哺育中华文化发展的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

江流域而言,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多地势平坦,土质疏松,雨量适中,大山少,江湖不多。这在远古时期,即使生产和交通工具极其原始,土地的开发和部落之间的交往也不十分困难,故该地区经济开发较早,至今方言较少,便于一些强大部落的统一,较早地出现了如传说中的黄帝族及以后的夏、商、周奴隶制王朝,从而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先驱和中心。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地质刚坚,高山多,大都呈南北走向,将该地区分割开来,雨量多,大江大湖星罗密布。这在生产和交通工具原始的远古时期,给土地的开发和部落之间的交往造成很大困难,所以该地区至今仍存在许多方言区,并长期未出现过本地区的统一王朝,经济和文化教育落后于中原。但从南北朝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就逐步赶上并超过中原。1991年《教育研究》杂志第一期刊载的浙江学者缪进鸿所作《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二十五史有关列传及其他资料中遴选先秦至现代的2677名杰出专家学者进行地区分布统计显示:在南北朝及以前,专家学者产生最多的为黄河流域的河南(60人)、山东(38人)、陕西(27人)和河北(26人)4省,而陕西咱唐五代以后已落后于南方各省。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首,从南北朝开始,迅速赶上北方。宋辽金时期,浙江和以前一直落后的江西,分别以49人和50人的高额超过中原诸省。明、清、近、现4代,江苏、浙江分别以397人和320人远超中原,居全国冠、亚之位,而最先超过中原的江西省此时已落于广东、福建、湖南、安徽、四川等省之后,浙江亦落于江苏之后。这说明无论南方北方乃至南北诸省人文发展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人才,从人才的出现可以探知一个地方教育的水平、质量和成败得失。因而开展地方教育史研究,探索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发展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必要的。越是地方特色浓郁的东西,越能丰富全国教育史的内容,因而越具有全国意义。

至于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据缪进鸿的统计,从先秦到南北朝的学者专家都为零,隋唐至明亦共仅 10 人,至清代才开始兴盛,清代 11 人,为各省第五位,近代 22 人,现代 64 人,均为第四位。而湖南学者陶用舒所著《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把统计对象扩大到军事、政治人才,从《辞海》、《中外历史人物辞典》、《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和《简明中外历史辞典》等六种辞书所列的杰出人物中,选出有省籍记载的 2047 人加以分省统计,湖南为 290 人,占总数的 14.17%,高居榜首。至于 1919—1949 年的现代杰出人才,至今未见有人作过类似的统计。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 5 位书记中,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3 位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 10 人,占 19.2%;1955 年授予的 10 位人民解放军元帅中,湖南籍的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3 位;10 名大将中,湖南籍的 6 位;57 名上将中,湖南籍的 19 人。这说明湖南自古到今的人文和教育发展道路颇有特点。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无论对湖南和全国都有重要意义。而湖南除 20 世纪 80 年代编纂过从 1840—1985 年的《湖南省志·教育志》以外,教育史研究尚付阙如。中央这次作出开展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决策,我们认为对推动湖南教育史的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扩展及深化,都是非常及时的。

二

纵观从古至今湖南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起始、初兴、兴盛与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四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秦及整个先秦时期都属于这个阶段,历时最为久远。其主要特点是:教育处于原始状态,只有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未发现有关学校教育的历史记载。

考古证明,远在地质年代的中更新世,湖南已有人类活动。1993年和1995年道县玉蟾岩发掘的距今12000年到14000年的稻谷和陶片,为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片。1988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9100—8250年的房屋、陶片和稻谷壳痕迹,比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省裴李岗文化遗址略早。1991—1997年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的古城和距今6500年的水稻田,比长江中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大溪文化遗址更早。又据传说,炎帝神农氏被黄帝战败后,率其部落一部分进入湖南,教湖南先民种植稻谷,神农氏及其亲属200多人死后葬于今炎陵县鹿原坡。这些都说明,湖南农耕文化的开始是比较早的。

关于远古湖南的行政建制和疆域,有名可考者仅尧、舜、禹时期的“三苗之国”和殷商、西周时期的“蛮荆”。

“三苗之国”始见于《战国策·魏策》所引吴起之说。明周昕《名义考》云:“三苗建国在长沙,所治则江南荆、扬也。”伍新福主编的《湖南通史·古代卷》考证:“当时的三苗国大致处于江淮、江汉平原南北,洞庭、鄱阳之间……说三苗建国于长沙,不大可信,但至少说明当时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域。”鉴于前文所述的澧县彭头、城头两山遗址都在三苗出现之前或同时,三苗时期湖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但生产力水平毕竟低下,不可能有剩余劳动力来充当专门的教师和学生,故学校教育肯定尚未发生。

“荆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湖南两省境内。它与殷商、西周同时,而殷商、西周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已有“官府之学”。湖南发现的殷商、西周时期青铜器为数较多,并不乏精美之作,但湖南学者对这些青铜器是否为湖南先民所造,尚有歧见。尧、舜、禹和殷商、西周王朝都多次征伐“三苗”和“荆蛮”,但均未能在湖南建立统治,故湖南先民一直保留着原始氏族的社会制度。直到春秋战

国时期并入楚国之后,才在楚人的带领下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由此看来,荆蛮时期的湖南,可能仍处于原始经济和氏族制的解体阶段,没有学校教育也就是必然的了。

春秋初年,楚国开始进入湖南,至战国初年,奄有湖南全省。楚国统治下的湖南,于春秋晚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1976年长沙火车站工地发掘的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钢剑和铁鼎,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碳钢和铸铁。由于铁器的使用,湖南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快的发展,并出现了20余座军事、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城镇。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出现了孔子门下“弟子三千”,“稷下学宫”,“学士数万”的学校盛况。按理湖南也已有可能出现学校教育,但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内,湖南并无关于学校的历史记载。楚国王室办了学校,名曰“渚宫”,但办在湖北而不在湖南。楚国还设有“公族大夫”管理贵族教育,长期在湖南生活的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管屈、昭、景三族的教育,但屈、昭、景三族是否居住在湖南境内尚无定论,而屈原的教育活动亦未见记载。至于庶民的教育,据清末学者黄绍箕所著《中国教育史》考证,当时对士农工商四民实行分业居住,分业受家庭教育,尚无学校教育。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政策,摧残文化教育,且秦代国祚短暂,故无任何教育资料可寻。

(二)初兴阶段。始于汉代,止于隋唐五代,历时1100多年。其主要特点是:有了学校教育,但数量不多,分布不广,发展缓慢,且兴废无常,教育质量不高。

西汉分全国为13部(州),部(州)下设郡、县。湖南属荆州,领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和长沙国。今湖南省全境,除江永(当时名“谢沐”)、江华(当时名“冯乘”)二县错入当时主要领地在两广的苍梧郡外,其余均为三郡一国所领辖。

西汉时期的湖南,除最初80余年成为戍守和平定南粤分裂势

力的前哨阵地和进军基地以外,社会基本太平,经济有所发展,且汉廷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促进了全国学校教育的发展。湖南虽然尚未发现西汉时期的学校记载,但从以下事实推论,湖南在西汉时期至少建有培养王侯及其子弟的宫廷学校。其一,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初长沙王丞相利苍夫妇及其儿子的墓葬,发现28种、12万多字的帛书。帛书以道家经典为主,包括战国史籍、医药文献、天文学专著和古地图等,与汉初的政治、学术风尚相符合。利苍等人以这些图书陪葬,说明他们对这些图书是熟悉的。如果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不可能熟悉和重视这些图书。其二,汉初著名学者贾谊在文帝时曾任长沙国第五代异姓国王靖王吴著的太傅。太傅一职并非专司教育,但贾谊在所著《大略》、《新书》、《胎教》、《保傅》、《审微》、《容经》等著作中阐述的教育思想都表现相当成熟。如果他没有比较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就不可能有这样成熟的教育思想。这说明贾谊在长沙王太傅任内,是认真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当然凭这两点只能推论出当时湖南已有了培养王侯及其子弟的宫廷学校,而不能证明当时湖南已有了民间学校。

东汉的湖南建制,除改长沙国为郡外,略同西汉。这个时期的湖南,除光武帝至桓帝100年间“五溪蛮”与长沙等地的少数民族多次起义、东汉末年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引起局部战争以外,其余年间,罕见兵灾,社会基本稳定,因而人口大增,生产发展较快。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湖南境内人口仅71.7447万,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人口增至281.3266万,130年间增长近3倍。《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七年(公元113年)九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说明当时湖南已初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区。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东汉湖南开始出现民间学校。《后